

孫中山先生家世辯爭平議

鍾正君

史家考證幾種爭議

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上世究竟是從江西直接南遷廣州府屬的東莞、中山？抑從江西東遷福建汀州，再南遷廣東嘉應州，又再南遷增城、中山？是國人爭論而有待繼續探考的問題。國父在世時，此問題並未有人注意，國父去世之後，中央着手編撰國父年譜初稿，時值東莞上沙、員頭山二鄉孫姓，爭認國父上世係由其鄉遷出，才引起人們的注意，黨國元老吳敬恆以及胡去非、鄧慕韓諸先生，對此均有論述，但互有參差，意見不一；歷史學家羅香林先生乃就諸人所說，加以綜合研究，並就有關各地，廣事徵訪，探求事蹟，深入研究，窮十年之血汗心力，於民國三十一年秋發表其研考結果之「國父家世源流考」一書，付梓問世。說明國父上世係由江西寧都遷福建汀州河田，再遷廣東長樂琴江都，即今紫金忠壩，又再遷增城、中山。此說一出，竟引起鄧慕韓先生的不悅，對羅肆意謾罵，並發表「國父家世源流正誤」一文，冀以推翻羅說，並訴之國父哲嗣孫科先生，希望支持其說，孫科先生未予採信。

。民國六十年，孫科先生手撰「八十自述」，將羅香林先生考出之世系冠於篇首（「八十自述」是孫科先生自己動筆，非他人代撰。手稿經由鍾天心先生親送國父紀念館珍存），至此國父家世源流問題，應屬塵埃落定；惟自孫科先生及羅香林先生先後謝世之後，又有中山孫甄陶先生重提異議，番禺祝秀俠先生亦有文提出意見，研討「國父家族歷史尚待考證」及「關於羅香林『國父家世源流考』的辯正問題」，兩文主旨，均在謀推翻羅說，孫甄陶先生說羅牽強附會，使國父世系成爲一個移花接木之世系，秀俠先生文擁護其說，認係羅著發表後，提出異議之有力辯正。茲將兩文所提，加以研究分析，藉以就正高明。

對孫甄陶文的研釋

一、美人林百克所著「孫逸仙傳」國父口述家世，是羅香林先生研究本問題的線索，也是確定國父上代由東江公館村遷出來的根據，關係非常重大，該傳內記國父口述原文爲「Choy Hung... that is the hamlet of my birth, and

the birth place of my immediate forebear I say immediate forebears, for we have live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Choy Hung.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, on the East River.」依原文直譯，應該是：「翠亨誠然是我與最近的幾代祖先出生的鄉村，但我們住在那裏只有數代，我們的祖先傳下來的家屋及祠堂，則在東江的公館村。」孫甄陶先生文亦首先提出此點來，欲圖推翻羅說，他的理由第一是：假定 Kung Kun 爲「東莞」而非「公館」，Kung 字頭一個字母爲 T 誤 K，係手民之誤。實則 K 與 T 字形不相類，誤植之可能性至微，羅著已有詳說。第二他說東莞亦屬東江，且強調爲東江主流所經，其爲東江屬縣，自應毫無疑問。不錯，東江下游是經過東莞縣北，不過東莞地域已在珠江三角洲內，縣境大部份在珠江流域，南、番、東、順各縣境內，均不少通入珠江的港汊，密如蛛網，大概就是珠江得名的由來，甄陶先生爲了使國父的說話盡量適合他的思想的要求，乃將譯文顛倒並添加「水域」字樣爲：「吾人祖祠所在之鄉村，乃在東莞，屬東江水域」。在

原文中沒有「水城」字樣，可能甄陶先生明知東莞係東江水域縣份，縣北雖為東江下游所經，但東江為構成珠江三大主流之一，愈在下游，愈是珠江範疇，故變更國父說話語氣，添加「水城」字樣，導人入迷。至其舉國父實業計劃，謂國父對東江與東莞之關係瞭如指掌，此亦不能說其先祖即由東莞遷出，蓋其對東方大港與北方大港之河汊亦瞭如指掌也。

東莞、中山兩縣，係隔水相望之比鄰縣份，如果國父的祖先是從東莞遷出，以國父語言文字之簡明扼要，只要說從東莞某鄉村遷來便可，絕不會再提「在東江」字樣那樣衍贅；惟有距離中山較為遙遠之紫金，才有指明方向在東江之必要。又東江源出贛南，經和平、龍川、河源、紫金、惠陽、博羅、東莞等縣，滙珠江入海，在博羅以上直至贛南，均為客家人聚居地域，又緊靠純客人居住的嘉應州，所屬五華、興寧等縣人士要赴廣州，均經東江搭船順流直下，廣州市中由東江來的人，絕大部份是客家人，可以說「東江人」就是代表「客家人」。一般來說，言東江絕不包括廣州府基本縣的東莞。所以國父特別提到的「東江」，必然是指客家地區無疑。又「東江」一詞，雖是河流，也帶點「方向」的意思，所以東江所指，不單東江沿河各縣，即連嘉應州所屬各縣亦包括在內。

是否客家人的探討

二、甄陶先生對璉昌、連昌羅說同屬一人之六點質疑評釋：

(一)「璉」字與「連」字各異 一般中國人均信「玉」能避邪招福，故常佩帶玉器，名字亦多加上玉旁，璉字一般字典辭書注釋多為：瑚璉為上古祭器，同連字。所以羅說為是。

(二)世次相同不足為奇 名字、世次同為康熙時人，東江公館村與紫金公館背村，及時代背景五者均同，則難能有此巧合，足為奇矣。

(三)流離狀慘，璉昌公難免已轉死溝壑 增城在清初為盜匪淵藪，居民多棄田徙避，康熙時寇患漸平，乃引致英德、紫金等縣人前來墾殖，璉昌公亦離鄉前往。紫金距增城不過二三百里，路途並非遙遠艱難，一個鄉下壯男，絕不致脆弱到轉死溝壑。

(四)連昌公到中山涌口開基後，為何不與紫金忠壩族人聯絡 連昌公到中山涌口，是定居，說「開基」似太嚴重。他之未與忠壩族人聯絡，第一、可能因與父兄參與抗清義師失敗，為避禍而離鄉，自未便將行蹤暴露。第二、因其兄璉盛未傳，其弟璉橋亦遠走他鄉，故鄉已無至親之人。第三、連昌公隻身到中山陌生地區，忙於立身維生，非已發財致富，又非貴顯光榮可誇耀鄉里，自無與鄉人連絡與致。第四、如連昌公讀書無多，寫信不易，加上當時郵傳不便，自難與故鄉連絡。第五、鼎標公係抗清著名人物，紫金忠壩為義民抗清大本營，根據地，為免招禍，自不便列之家譜祀之祠廟。

(五)國父未嘗言其上世源出客籍 客家人自中原輾轉南遷，到每一地均為後至，常受當地先至者之忌視，廣東在清末民初，便有多次廣府人排

客風波，所以客家人到廣東省會的廣州市，多不言自己是客人；又洪秀全率客家子弟奮起革命，客人被清廷視為叛逆，為免招禍，亦為諱言客人之原因。國父以中山人奮起革命，自須獲革命策源中心地廣府屬人的支持協助，自不宜隨時隨地言及上世根源，以自樹藩籬，招致阻力，減少革命實力；但亦非絕未言及，當廣州新軍起義時，他便對姚雨平將軍說過他上世來自嘉應州，民九到潮汕檢閱粵軍時，順道到梅縣松口拜會謝逸橋、謝良牧兄弟時，亦會對當地督調他的父老言及他是客家人，特少為人知耳。至客籍社團特予招待開會歡迎一節，一因羅著未發表前多未知國父是客家人，二因當時極少此種風氣。更有為甄陶先生告者，胡漢民先生，人均知其為番禺人矣，又安知其祖若父，亦為江西南部慶陵縣客家人（見世界客屬總會所存文獻），胡先生亦絕未對人言及。

(六)連昌公迫於生計，應投向增城客人聚居地求助，為何舍近圖遠而至中山沿海，非人情所近 連昌公赴增城墾殖未久，值政府宣布沿海復界，獎勵人民前往，增城已非沃壤，根基又未深植，自然便是最適宜於再遷的人，何況客人南來多居山地，渴慕沿海土地的肥沃，連昌公隻身在增城，自非為顧目前生活，而是要展望未來，有此良機，當然欣然毅然前往。

對祝秀俠文的評析

一、孫滿先生所提意見

(一)孫滿先生說：「民國廿三年陪同鄧慕韓先生赴東莞各地視察孫氏宗祠，取閱族譜，果有十

二世祖連昌公名，與翠亨孫氏家譜相符。」連昌公既然非由東莞遷往中山的始祖，出生在中山涌口，為何在東莞孫家的族譜中又有連昌公之名？此點有些使人不解，難道由東莞遷往中山的孫姓，仍按期將子孫名單送東莞老家上譜？不知是否尚有所謂連富、連德等名字否？

(二)關於吳稚暉先生所提出粵孫氏遠祖孫固及孫常德一點，業經羅先生分析不是。國父先祖，羅先生意見且經吳先生審查認為正確，親自主持頒獎給羅先生。更有請孫滿先生注意的，則是哲公對此問題，數十年中，不知聽過多少意見，看過多少文籍，到晚年手撰「八十自述」時，仍將羅的考證鄭重列諸篇首，且特別聲明：「我的祖先都是深明民族大義，很重氣節的。宋亡，則不仕於元；明亡，則不仕於清。到了抗清兵敗，就乾脆隱居起來，過着耕讀傳家的生活。這種屢世相傳的民族大義，對國父的影響是很大的。他後來之所以領導國民革命，推翻滿清帝制，一方面固然是受當時環境所刺激；另一方面，也未嘗不是祖先遺傳的結果。」其中有「宋亡，則不仕於元。」一句，孫滿先生如果驟然確認做過元朝杭州刺史の孫常德為祖先，那哲生先生便不好交代了。至 King 一音之為「公」而非「東」前面已有釋說，目前坊間英文譯音字典，一翻便見，尙再牽拉，便無意義。

(三)民國廿二年九月，羅先生到翠亨拜見妙西姑太時，取閱的「孫氏列祖生歿紀念簿」，據述首頁第一人即十二世祖連昌公，並無瑞英名字；達成公遷葬之列祖墳墓，即連昌公以下墳墓，亦

無瑞英墳墓（達成公且在家譜中註明：「茲以前，先祖在涌口所葬之山，於光緒六年七月，一概已將先祖之墳墓，一切搬遷回來，在翠亨村翠頭尖土名竹篙龍真武殿安葬」）。今孫滿先生則謂紀念簿載有十一世祖瑞英公、十世祖植尙公，與羅說大異，羅說在其專著中公開發表已數十年，如有不實，在當時孫滿先生事關自己祖宗，為何不設法糾正？孫滿先生又謂廿三年偕同鄧慕韓先生到翠亨村墳地察看時，確有上代金塔十餘個。文中雖未說明是誰人之金塔，但意思則在證明上代係由東莞搬來，是自己祖宗金塔。金塔係未下葬之骨罐，達成公明明謂一切祖墳均在真武殿安葬，為何尚有十餘金塔？如果真有金塔，而達成公未予安葬，那一定不是達成公上代祖先的金塔，而是別房別派的。

(四)孫滿先生提到妙西姑太所述敬賢公及達成公均相信風水，終身供養一位來自嘉應州的堪輿先生，各祖先墳墓，都由達成公尋得風水最好之地墳改葬一節，除了可以證明係上段所述尙有十餘金塔之言有待考究外，對國父上代家世亦極關重要。因為客家人係舉家遠從中原輾轉南遷的漢族正統，萬里關山，不知經過多少崇山峻嶺，眼看着起伏的山巒，即意會到動物的各種形象，配合着重視祖先的倫理文化，養成了相信風水的習慣。敬賢公與達成公熟知其祖先來源，承襲了此種習性（廣府屬人世居廣大平原，大多少此習性），而供養了來自嘉應州的地師，可能就是因他們知道祖先便是來自嘉應州，所以相信嘉應州籍的地師的緣故。

譚著新證價值之辨

二、譚彼岸發表「孫中山家世源流新證」評釋

譚某之文係為被羅氏推翻諸說求翻案，所以其依據的，仍為羅氏認為有自別譜抄入混雜的翠亨孫氏族譜，及一九五一年，中共在廣東中山縣土地改革中所發現的孫梅景等賣田契一張，及達成公兄弟開荒合約原約一張，與復本二張。關於翠亨孫氏族譜方面，譚其所稱十二世祖連富、連德、連昌、表騰、廷尊、□□、表國、表生八人，不知是否在譜中列為十一世祖瑞英公之子，在羅著中未見提及，譚文亦未提及；而在此八人中，前三人共一連字，後五人有三人共一表字，一人失名，一人為廷字，如此雜亂，且有八人之多，與國父上代甚多單傳，頂多三人者，頗不相類。似拼湊成的，或非一人所生，而連富、連德等有無子孫？其狀況又如何？實值得深入研究。羅著發表後，尙有連富、連德、表騰、廷尊、表國、表生等七人中任何一人的子孫，出而指正羅考的錯誤，則羅說早就立腳不穩，無須諸公費那麼大的力氣去力謀推翻羅說了。但是直至現在，仍未見連富等人的子孫出面說話，轉使人懷疑連富、連德等是否真有其人？自不足以動搖羅說。此其一。譚文中僅提及達成公兄弟開荒合約字樣，此外未有半句敘說，亦未見合約原文，秀俠先生或許已看過其全文，代譚說明為：「孫中山先生父親達成公兄弟批墾其十世祖瑞英公逕仔訪山埔的合約，證明瑞英公遷居逕仔訪的記載確為事實，從而否

定羅香林謂 國父十二世祖連昌公與十一世祖瑞英公無傳代關係，翠亨孫氏非自遷仔藪遷去的說法。「客家人子孫，因流徙異鄉，所到之處，均無現成田產，開荒開墾，已成習慣。達成公家到翠亨雖有數代，但仍感耕地不足，所以仍向鄉村遷仔藪批墾土地。照一般鄉俗傳統，假如瑞英公係達成公的直系祖宗，則對祖遺土地，分地承墾便可，無須訂約批墾；訂約批墾，係對別姓別房手續，似可證明瑞英公非達成公之上祖。瑞英公遷居遷仔藪的事實，羅先生並無否定之詞（羅考定瑞英非連昌公之父，是因連昌公係康熙時人，瑞英則是乾隆時人），此不足否定羅說。此其一。

。孫梅景等出賣祖遺嘗田，此有兩點研究：第一、容寓公如果是過千公直系的七世祖，則其嘗田，過千公有承耕權利，承耕便可，又何爲出之買賣？過千公與孫梅景等已同爲容寓公子孫，那田又是嘗田？而不是分與孫梅景等的田，爲何一個是賣主一個是買主？此點只可證明過千公非容寓公派下子孫，不妨礙羅先生立說。第二、與過千公合買容寓公嘗田的孫廷尊，如不是譚某爲推翻羅說而特意虛加，則孫廷尊究竟是什麼身分？倒是值得研究。因田契中沒有說明，而其名字列在過千公之前，說是過千公之叔或兄，則翠亨孫氏列祖生歿紀念簿未載，如只是過千公同族別派較要好之親房，則又很少有合買田地可能；果如譚某所說係過千公之胞叔，亦即連昌公之胞弟，則對羅的考證便構成莫大的威脅，甚而可因此而推翻其說。但如說容寓公是 國父的七世祖，在明朝嘉靖年間，便已遷居涌口村，則 國父對林

百克所言在中山只有少數幾代之說，又作如何解釋？ 國父向來不打誑語，不說虛話，此文關涉太多，容當另加研究，再作詳論了。

以上分析，係因甄陶先生與秀俠先生兩文，均偏重推翻羅先生的考證，而羅先生業已作古，無所申說，故本文以不忽視羅的成就來評析，如此才能得其均。倘蒙甄陶先生及孫滿先生進而匡教，則事實愈辨而愈明，必能對 國父家世之探究有所助益，此亦拋磚引玉之意也。

研究工作更進一步

羅香林先生所著「國父家世源流考」一書付梓問世後，數十年來，雖間有異議提出，要不能撼其立說，故能使廣識明智之孫哲生先生，終其一生堅信羅之考證爲確實。雖然如此，但連昌公在增城之狀況如何，由增城赴中山之經過又怎樣？等等，仍應作進一步探考。今甄陶先生認識此事之重要，重提研究，自屬有心人，值得欽佩；其所提研考途徑，亦多有價值之意見，值得重視。

不過甄陶先生自稱與羅教授爲知交，且謂羅曾兩次持贈該書求指正，而甄陶先生在其生前既無一字提供其參考，在其死後又苛責其作品若是，兩不相稱，令人慨歎！

翠亨孫氏列祖生歿紀念簿，爲羅氏考定連昌公由紫金、增城遷至中山之依據，關係非常重大。羅先生謂該紀念簿首頁第一人即連昌公，並無瑞英名字，且曾一再公開提出，孫滿先生事關自己祖宗，當時既無隻字提出異議，到羅去世才謂

自己抄的副本，有十二世瑞英公及十世植尙公，當年尙無影印機，兩人所抄亦難辨別真偽，而妙西姑太所存原本，今落何所，又不可知，如已失落，則永成疑案。羅先生根據 國父所言而採集資料作考證，相信其並無私心，亦不會存心作偽，祝先生之文如紀錄不訛，則孫滿先生謂其「千方百計」「虛構」，亦屬過當。孫滿先生係達成公傳下系列的長曾孫，對上祖來源的考證，有比治平、治強諸先生更爲重要的責任，希望能整理保存現有的各項資料，搜求更充分的有關資料，虛心作再進一步的研考，以是正祖宗根源。末學與治平先生爲素識，與治強先生亦有一面，爾後有機，亦當拜會孫滿先生，以求教益。

國父家世之仍當繼續探考，自屬無可置疑之事，但應以求「真」爲鵠的，我們大多是紙上談兵，沒花過多少功夫，羅香林先生則付出過十年血汗與無限心力，所以其研究之成就，不必一意求推翻（憑意氣求快一時，於事無補），而應作爲再進一步研考之指引；不過在多難的國家當前環境下，研考此問題之道路，更爲崎嶇坎坷，誠如甄陶先生所言，大陸粵東沿海各地，自中共統治後，宗祠多已改作公社，祖先牌位及族譜已遭毀滅，墳墓多被破壞發掘，欲更進一步考證 國父上代世系，更爲困難，雖然如此，但此項工作十分重要，仍應突破困難，積極籌劃實施，並應籲請黨史會及國史館董其事，才能期其有成。秀俠先生望重文壇，出而號召，當見功效。本文成於倉卒，其有語言失謹，開罪於甄陶先生及孫滿先生之處，還請海涵賜諒。